

# 高校人才“输血”之惑

■本报记者 陈彬

对于一所高校而言,该招聘什么样的人,怎样招聘人,这是个问题吗?

不久前,教育部人事司司长管培俊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新一轮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已经在眉睫,而此次用人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在教师分类基础上推进聘用制度。

对于聘用制,熟悉高等教育的人士并不会感到陌生。早在2000年,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就曾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明确提出了高校“全面推行聘用制”。然而时至今日,教师聘用制依然没有真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高校是一具鲜活躯体的话,对于如何为其输送新鲜血液,人们似乎依然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从这个角度上说,高校该招聘什么样的人,怎么招聘人,真的是一个问题。

## 最大差异:职业准入?

关于“聘用制”,国内高等教育界其实已经持续讨论多年。

三年前,一场题为“学术职业变革”的国际会议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校研研究会会长刘献君盘点了我国高校教师聘任中存在的10大问题,并坦言我国和美国等西方高校在教师聘任上最大的差异在于缺乏“职业准入”。“在美国,要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有5-7年的‘准入期’。设置一个‘准入期’,既有利于看清自己是否适合在高校做老师,也有利于高校看其是否适合在学校工作。”

同样是在几年前,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某期校报上,刊发了该校当年暑假工作会议上的一篇发言稿。其中,对于教师准入制度有着这样的表述——我国大学教师聘任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准入”制度……美国、德国等国实行的大学教师试用期阶段评价体系恰恰是我国大学教师评价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应借鉴美、德等国大学教师甄选优化机制,设立“试用期”,一方面教师继续提高自己、审视自己,大学也可以有足够时间考查教师是否适合大学教师工作。

对于目前国内的教师聘用制而言,缺乏职业准入似乎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否是“最大差异”呢?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一直呼吁在国内高校建立真正的教师聘用制度,然而对于设立所谓“准入期”,他却表示并不赞同。

“在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用几年的时间来观察一名老师是否称职。”在采访中,熊丙奇说,国外高校即使存在所谓“准入期”,也是用来衡量某位教师是否有资格进入“终身轨”,进而被聘为终身教授,而非考核教师是否可以留任的“实习期”。

对于这一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也表示,国外高校在录取员工时的自主权是非常大的,他们也会针对特定岗位设置某些特殊要求,但这并不能被他们就一定有所谓的准入制度。“国外高校在录取员工时是很灵活的,反倒是国内高校相比之下要求要更加刻板。”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在大学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普及的过程中,高校在教学和管理制度方面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渐渐显示出一定的欠缺。高等教育该如何为本,成为了大学的管理者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一次工作会上,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罗维东的一句话,令北科大高等工程学院副院长赵志毅感受颇深——“一所大学的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如果没有学生,大学就不成为大学。”

事实上,这种“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不仅存在于北京科技大学管理者的思考里,也贯穿于他们的教学管理实践中。近年来,北科大以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需求为教学管理工作的根本目标,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管理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 打破转专业门槛

在机械学院副院长夏德宏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雪糕棒手工编织成的笔筒。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笔筒对于他却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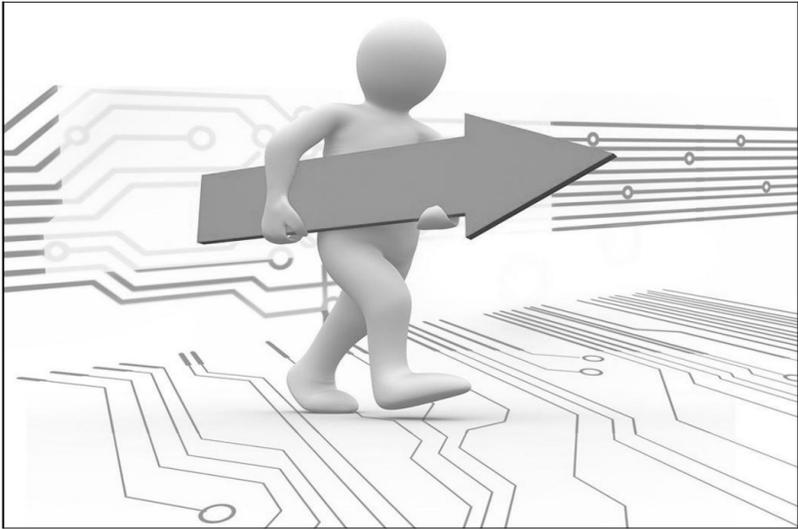
笔筒的制作者是机械学院工业设计1302班学生傅伟,她原本是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高考的时候觉得自己计算机编程的水平还不错,她就选择了计算机专业。然而等进了大学,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有一天,她经过机械学院,楼下正在进行工业设计专业的毕业设计展,看着这些设计展览,当时就觉得我的兴趣和天赋都在这上面,知道以后自己的职业就是这条路了!傅伟对记者说。

当转专业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她就向学校提交了申请。没想到特别顺利,很快她就获得了批准,“转专业之后,虽然课程和作业都很多,常常忙得焦头烂额,但是因为自己喜欢,心里一点都不觉得累。”傅伟为了表示对夏院长的感谢,送了他这个手工编织的笔筒。

而对于夏德宏来说,这个笔筒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为学生服务,就是以学生为本。满足学生的兴趣,这对他们今后发展的作用不可估量。”

不限制转专业人数比例,不要求成绩排名,不设跨类转专业限制,大一、大二各有一次转专业机会。——傅伟只是北科大2010年出台的转专业政策的众多受惠者之一。

北科大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薛庆国介绍



目前我们的教师招聘还基本沿袭着传统的招聘模式和标准,对于学历、资历等硬性标准看得比较重,而这些标准其实很难有一个明确且细化的对比度。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既然如此,那中西方高校聘用制度的最大差异究竟是什么?

“这太多了。”熊丙奇笑道,比如,国外高校是学校自己设定条件聘请教师,我们却有很多国家层面的硬性条件;国外高校看重学校内部人才聘用,有专门的教授委员会和人力资源负责监督,学院有很大的自主权,而我国的行政力量却可以很容易地干涉高校聘任工作。

“谁来评价?怎么评价?这就是差别。国外是学术机构评价,我们是行政机构评价;国外是学术指标为重,我们是行政指标、数量指标主导。这才是核心问题。”熊丙奇说。

## 博士资历 = 入职门槛?

作为一名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侯定凯曾在国外学习和生活多年。对于中西方高校招聘制度的差异,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与国外高校相比,国内高校在教师招聘标准的设定上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标准过于单一。”侯定凯说,比如一所高校既需要教学人员,也需要行政人员、后勤保卫人员等。学校本身也有研究型大学或教学型大学之分。但目前我们的现状是,无论何种大学,无论招聘何种岗位,似乎标准都是一样的——博士学位、海外留学经验、发表论文数量和刊物等级……

刘东(化名)是国内某重点高校人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于侯定凯的说法,他也坦言“这的确是个问题”。

“目前我们的教师招聘还基本沿袭着传统的招聘模式和标准,对于学历、资历等硬性标准看得比较重,而这些标准其实很难有一个明确且细化的对比度。”刘东说。

通过观察,侯定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外高校中,很多大学校长都来自于企业的管理层,尤其是在一些大学的商学院,这方面

的趋势要更加明显。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高校录用人才时,究竟应该重点考虑学历,还是考虑背景、从业经历等?”侯定凯说。

事实上,针对目前高校招聘教师时,设定“博士门槛”这一普遍现象,武汉大学原校长顾海良就曾呼吁,大学不能过度“博士化”,并表示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教师职业,它既要求从业者具备某些条件,譬如性格开放、善于表达等,又需要有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接受分阶段的专业训练。

显然,这些都不是凭借“博士学位、海外留学经验”等标准能够查出来的。

采访中,刘东表示,高校招聘标准雷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招聘权行使得不合理。“国内高校几乎没有设立专门的招聘机构,招聘权大多在高校人事部门和院系临时组织的招聘机构手中。但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精力有限,且对用人单位不了解,很容易造成在招聘标准上缺乏针对性。”

熊丙奇则将这一问题归结到了高校行政化的问题上。“这就是行政化、一刀切带来的恶果。”熊丙奇说,正是由于招聘权对行政权过于依附,才导致行政化主导一切,从而产生单一化,甚至于教条化的招聘。“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曾经不拘一格录用人才,这也造就了北大的教育奇迹。想想现在,这还可能吗?”

## 什么才是“行政化”?

提到“行政化”,侯定凯又想起了一段往事。几年前,侯定凯曾到香港浸会大学进行师资情况调查。调查中,他发现这所学校行政人员的比例,超过了一线教师,这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大陆都在倡导教师比例不能太低,否则就是行政化色彩太浓的表现。”他问校方,他们不担心行政人员队伍太过庞大吗?

## 北京科技大学创新教学管理制度,新理念深入人心——

# “以学生为本”

■本报记者 钟华

说:“站在学生的角度审视和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关注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充分挖掘每个学生的优势和潜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需求,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正是我们教学管理改革的核心。”

有一句诗薛庆国常常挂在嘴边:“虽然受办学资源限制,不可能做到让每位学生都学上自己最喜欢的专业,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让学生不学他不喜欢的专业。”

说到转专业,一般学校会首先限制转出的人数。因为大家会考虑到,如果某个专业的学生都转出了,老师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反思,这个想法是以学生为本还是以老师为本?”去年底,学校还出台了专业调整政策,对专业每年进行评估。评估的三个依据:第一是招生录取时的调剂志愿率;第二是一年后申请转出的指标;第三是学生毕业时的签约率。

“这三个指标都不理想的专业,我们会考虑停办。”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

## 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工程学院、理科试验班、黄昆班……北科大积极探索学术型拔尖人才、国际化创新人才、工程研究及应用型人才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来满足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需求,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为培养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学术型拔尖创新人才,2007年北科大开设理科试验班,依托优势学科,强化理科基础,聘请院士、长江学者、知名教授等开设学术前沿课程或专题报告,制定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政策等。在后期,学生可自主选择专业学习,综合排名在前50%的学生可自

主选择指导教师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进入导师的专业实验室,参加科研活动。

材料物理系2010班学生田耀霖,是个听到“量子物理”这四个字眼睛就会发光的物理迷。在理科实验班,他得到了一片适合自己成长的沃土,“我们从大二就开始做本科生科技创新。从学生到科研工作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把我们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做科研要读很多文献,英文阅读、论文写作的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我体会到有两个方面的提升,一是我们的学术能力,二是我们与人沟通的软实力”。

2010年,作为首批入选“卓越计划”的试点高校,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了高等工程学院。为了让学生真正热爱工程,在工程中受益,学院下功夫规划各种实践活动,在大型钢铁企业及科研院所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学生的校外导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科研意识明显增强,效果显著,这一培养模式也得到合作企业的认可。

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欣欣说:“为国家钢铁工业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服务理念。如何服务学生,满足学生的需求,在培养过程中有增值的效果?我们在教育中也需要有服务型的思维模式。”

## 科技创新纳入培养方案

北科大开拓了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海(境)内外交流、修读第二(辅修)专业、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等多种途径,让学生得以拓展成长空间,加强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

## 中国大学评论

# 外语的『神话』还要维持多久

■尤小立

最近几天,先是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第九届亚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上透露,2017年英语将退出高考,随后,顾先生和教育界人士先后出面辟谣。前者称,媒体误读了他的意思,后者则以“高考方案仍在制定之中”来解围。一席关于高考取消英语考试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波澜,自然体现出国家政策的社会影响力,但在这个政策的背后,则是近三十多年有关外语的种种神话。

众所周知,外语考试(主要是英语考试)不仅是高考的重要内容,大学里的职称晋升、研究生考试以及出国进修、留学也都一样,申请者非考外语不可。外语考试如果仅仅作为普通的一门课程考试,并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心。它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我们给外语附着了太多外语以外的东西。

作为人才选拔工具,外语本来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它的考题相对客观,部分地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但问题是,在考试为大的当下,外语既然成了维护公平最重要的砝码,它的地位必然直线上升,让本来相对公正的选拔工具变得绝对化,从而形成了“外语依赖症”。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即是一个例证。在如今的硕士招生考试中,外语依然是由国家统一命题,统一考试,这样“一刀切”的统一政策似乎是在保证公平、公正,但实行起来,却根本统一不起来,因而公平、公正的效率也远低于预期。原本60分的及格线就一再地被突破,甚至一直下探到了40分左右。在北大的统招招生原则已经过时的今天,外语40多分考取硕士不再是梦想,其结局是皆大欢喜的“双赢”。

与选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通过考试选拔进入高校的学生对英语学习却很难再保持初中、高中时代的热情。这当然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生本来就对英语没有什么兴趣,一旦进入大学,就更没有兴趣,他们也成了令英语老师喊冤的对象;另一种是英语学得相当好的学生,他们在高中的托福或雅思成绩已经比许多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还高,这部分学生进入高校后,很少有公共英语的老师能够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也自然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高校在研究生入学之后象征性地举行一场测验便允许过关的学生免修第一外语的原因。

在外语成为最值得依赖的选拔标准后,专业课在考核、考试中仿佛变得越发无足轻重了。它们既拉不开考生分数的距离,又因为相对“灵活”而失去了评判的可信度。而越缺乏信任,就越不可能形成公正的评判。这种恶性循环继续蔓延的趋势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扭转。

外语之所以逐渐变成“神话”,是因为不能随便地对它说“不”。因为外语在许多人的眼里不仅是语言,它还牵涉到一种对外来文化或文明的态度。这次高考取消英语的消息披露后,就有人担心中国可能走向封闭,或者以为是GDP催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起作用。结果,此事立即变得严重起来,惹得有点知识的人的心情不能笃定。

从深层看,这或许与外语的国家统一考试所展现的国家意志有关。不过,从公平砝码到国家意志,外语承载的东西让它显得重要无比的同时,也让它失去了本质,失去了应有的自然、轻松和洒脱。看见一位完全不懂汉语的外老,来中国一年后,连汉字还认不了几个,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的那些把外语捧上天、在难度上不断加码的国人不知作何感想?我们整日里抱着课本做练习应试时,有这么轻松、洒脱和自信吗?十几年前就有人呼吁认真检讨一下外语教学了,可是至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还没有实质性变化。过多地注重应试,已经让学生感到外语课好像不是在教你学会这个交流工具,而是让你惧怕这个东西。因为它被强调得太过重,重要到很可能让你感觉到自己不是东西。

就本质上言,外语就是一种交流工具。既然是工具,它就该听从业者的意志,就没有必要被那么大声嘶力竭或上纲上线地强调。在一个开放的时代 and 已然开放的中国,根本不必担心外语被国人搁置或遗忘。因为无论是外向型的经济,还是学术交流、出国旅游,交流都需要外语这个工具。有需要才可能产生兴趣,兴趣让学习不再痛苦。

将外语还原成一个工具,只是还原它的本质,并不是有想去贬低外语的文化价值。从这个视角去理解,外语不是高考的内容,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然,用专业课的成绩和专业成就来衡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肯定要比以外语这个工具来衡量专业水平正常和公正得多。



高等工程学院工程实践